



不接受“996” 不是不能吃苦

赵 昂

一些企业以各种理由让员工采取“996”工作时间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在一些互联网公司，所谓“996”，即每天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考虑通勤问题，以北京市平均52分钟的通勤时间，19.2公里的通勤距离来算，很多员工实际上都是“8106”的上班模式，早上8点出门，晚上10点到家。在这样的状态下，员工几乎没有个人休息和家庭生活时间，对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关系都有不利影响。

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谁又愿意背上“996”的重负呢？但是，现在却有了这样一种声音，随着95后步入职场，一些用人单位表示，年轻员工“不接受‘996’就是不能吃苦”。

《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按“996”来计算工作时间，除却午休每天工作11小时，那么，用人单位恐怕四天就用完了六天的工时上限，那另外两天的22小时又该怎么算呢？

根据法律规定，加班不是没有前提条件、没有时间限制和没有待遇要求的，加班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被协商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和”不是“或”，那么，有多少加班事先是经过协商的？

在加班时间上，法律规定每日“一般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如果这么算的话，“996”工时制每周多用了18小时，半个月就用完了一个月的加班上限，那后面的36小时该怎么说呢？

另外，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应当支付报酬，工作日延长的是150%，休息日工作又不能补休的是200%，如果这么说的话，“996”工时制下，算上加班费，企业应当支付给员工的薪酬已经比正常薪酬多了一倍以上，那么，有多少企业足额支付了加班费？

以各种理由要求员工超过法律规定时间加班，并且未能足额支付加班薪酬，企业投资人和管理层享受着员工加班带来的红利，然后再给员工贴上“不能吃苦”的标签，这个板子，似乎不该打给“不能吃苦”吧？

年轻人吃点苦是有助于成长，但吃苦的前提是，自身合法权益和待遇得到充分保障。当投资人看着财务报表和股价时，当管理层享受着各种激励时，是否也应当意识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取决于员工，只有为员工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平台、合理的薪酬空间和可以保障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员工才愿意真正与企业共成长，而不是只为打一份工。

(上接第1版)

“建设创新型国家，向科技找规律至关重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董事长熊群力说，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要准确把握发展阶段性特征变化，选择科技研发重点，兼顾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

年逾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一职。他说：“对于雄安新区的发展，要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打造发展的新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首先就是‘逼’科技工作者。”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下一步要狠抓落实，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我们也要不断增强推动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本领，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出成果、出人才。

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

5月30日，首台自主研制的国产海上平台25MW双燃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完成交验，海上油气田开发建设拥有了“中国心”。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所长林枫说：“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基础创新，让科研人员在创新的王国里驰骋。”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表示：“大国竞争的背后，是科技实力的较量。没有强大科技，我们只能在产业链中低端徘徊。向科技强国迈进，必须坚持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处在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进军路上的当代科技人，应当有着怎样的使命担当？

传染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副总师徐建国院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重大传染病防控和疫苗研制，让我们感到振奋。重大专项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集中攻关，有力改善了民生福祉。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及其团队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薛其坤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任务，对两院院士提出殷切期望，我们要抓住这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不等待、不懈怠，拿出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到2020年，我国全职从事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将达到2000万人，但目前大部分并无“五险一金”，缺乏保障机制

“生活就靠一单单跑出来”

编者按

打开手机APP轻轻一点，外卖骑手可以将美食送上门、代驾司机会在酒店门口等候、家政人员立即上门服务……这些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人，被称为“网约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一群体不仅人数不断在增加，而且正在从过去的兼职向全职转变。正因如此，网约工的权益维护问题是个全新课题，北京市朝阳区审结网约工劳动纠纷第一案距今不到一年时间，当时，7名APP平台上的签约厨师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最终得到法院支持。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2020年，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预计将超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和网上平台之间究竟有没有劳动关系，是否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并享受相应待遇，发生劳动纠纷和工伤等如何维权？这些问题，网约工需要的不仅仅是权威解答，更需要有关方面加快立法速度，并予以有效监管。

本报记者 曹玥

外卖骑手王先生，已经在家中休养了3个月，原因是今年春节后他送外卖时与他人碰撞，腿部骨折。尽管保险有所赔偿，但“赔偿的3万元仅够医药费，但不能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没有工资和补贴，家人还指望我养家糊口”。

究竟该通过何种途径向谁索要这3个月的工资，王先生自己并不知道，而在现实工作中，类似王先生这样的“网约工”，其面临的劳动问题并不局限于工伤本身。在今年3月全总发布的《推进货车司机等群体从业人员职业化方案》，实现“八大群体入会”中的“八大群体”里，就包括了王先生所在的群体——网约车司机。

面对处罚只能被动接受

北京的网约车司机何师傅两个月前刚在某平台注册账号，“蜜月期”还未过，账号就被关停了，关停的原因是有乘客投诉他“拾到贵重财物不予归还”。

何师傅觉得自己很冤枉，当时，乘客将钱包遗落在车上后，他并未发现。第二天何师傅驱车到了郊区，乘客来电希望他能将钱包送至某处，因为两地相距30

多公里，车程将近一个半小时，他便与乘客商定了油费，并最终物归原主。但后来的事情则是，平台只因为乘客的一面之词投诉，就将何师傅的账号关停，何师傅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也没有得到处理结果，3天后账号虽然解封了，但这3天的损失却“无处说理”。

《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消费者的投诉往往会在网约车处于被动态态，有些网约车不会同时向双方了解情况，网约车经常“莫名其妙”被处罚，并无申诉机会。

“一个差评意味着我们半天的工作可能都白干了。”某外卖平台的骑手张先生向记者说，他经常会对自己说“声个好评”。根据平台的规定，一个好评可以拿到的奖励金只有几元，但一个差评则直接扣除50元钱，这意味着多少单都“白送了”。“有时候消费者无缘由给出差评，可平台不了解情况啊，50元直接扣掉。我们并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能默认。”

“以罚代管”是网约车平台的常用管理办法，当然，在处罚的同时，有的公司也会设立奖励机制以调动网约车的积极性，“但是这些奖励门槛完全掌握在平台的手里。”网约车司机王师傅坦言，“比如平台规定，多少小时内跑满多少单即可获得奖励，但派单权在平台手里，且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经常会出现快达到奖励门槛，平台就不派单或者派很远的单，无论我多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获得奖励。”



对于厦门人而言，在过去的60年里，不论城市如何变迁，有一个地标从来没有变过

工人文化宫的一个甲子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李剑婷

1978年：没票，站着也要看

张金城是文化宫第一任文艺科科长，也是《骄杨》曲谱的改编者。1978年，文化宫准备排演当时在全国十分火热的剧目《骄杨》。《骄杨》原是由长沙市歌剧团创作，听闻消息后，文化宫派人赶赴长沙，拿到创作总谱，由于只有业余管弦乐队，一些乐器并不全，所以排演前必须先改谱。

“为了赶进度，我没有回家，而是把自己关在文化宫里整理谱子，花了十几天时间才改好。”张金城说。曲谱抄出来后，张金城却傻眼了：“抄谱的人不懂五线谱，照葫芦画瓢，里面的‘豆芽菜’，乱点，和声都不一样。”后来，张金城仔细整理，根据和声关系和现有的乐器效果，改编成适合演奏的曲谱。这次创作经历，还让他留下了眼疾的毛病。

《骄杨》正式演出后，场场爆满，好评不断，甚至一票难求。“每场1080个座位，企业凭工会介绍信领票，但票还不够，很多没票的观众硬要挤进来，站着看也好。”张金城说。

80年代：职业演员从这里起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意识萌芽，文化活动类别也增加了，文化宫成为厦门的文化中心。

这里不仅有象棋、灯谜、篮球、电影、诗朗诵等各类文体活动，也是挖掘文艺人才、培养文艺骨干的重要平台。“文化宫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这里，我才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现为厦门歌舞剧院国家二级演员陆以诺就是从工人文化宫走出来的。

1981年，陆以诺在思明区人民医院当药剂师。因为热爱文艺，他经常在文化宫广场上的土台子说相声，渐渐地，被文化宫戏剧部老师发现。后来，陆以诺在文化宫参加了三期的话剧演员培训班。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下班后的他准时参加培训，一直坚

漏洞百出的保险

外卖骑手宋先生，有时候会发现自己要面临一个苦笑的选择，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险，是优先让自己躲开，还是让车躲开。“因为有保险，车没有，车撞坏了没人赔。”作为兼职骑手，每次接单都会有一份意外保险，但是“只保人不保车”，维修费自理，平台不管。当然，这个意外保险赔偿额也是有限度的，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骑手垫付的情况并不鲜见。

代驾司机师傅与代驾平台签订了一年合同，每天工作4~5单，常常深夜一两点还骑着折叠电瓶车在郊区奔波。每接一单，平台会从代驾费中扣除两元充作保险费，保险成本变相加给了代驾司机，更为关键的是，“保险只从接上客人到本单结束后两个小时之内用，如果我去接乘客的路上发生意外，保险却不涵盖，而此时正是代驾司机在深夜中骑着折叠电瓶车，非常容易发生事故。”

相关保险机制的漏洞百出，不仅在投保阶段存在，在兑现过程中也存在。在家休养了3个月的王先生并没有工伤保险，也没有工资，“公司只给我们买了人身意外险。”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要求企业支付休养期间工资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网约工”与网络平台之间究竟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网络平台是否应按照国家规定为网约工缴纳法定“五险一金”，全职和兼职“网约工”待遇是否一致，这些都需要尽快予以立法明确。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沈剑峰就表示：“如果企业对网约工有较强管理色彩、严格制度要求的用工形态，这种情况下，则可以认定网约工和企业间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企业应该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大部分网约工而言，企业从未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形同“隐形”，一旦发生意外，缺乏保障机制。

“从没仔细看过合同”

自从离开工厂当了网约车司机，何师傅从未有过养老保险，社保缴纳情况也不清楚，“没有保障，与公司签的合同中完全没有涉及这些。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生活就靠自己一单单跑出来。”如果有一天跑不动了怎么办，何师傅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事实上，有关网约工劳动纠纷的案件数量正在与日俱增。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布《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这家法院曾审结了网约工劳动纠纷第一案。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年一季度，朝阳法院共受理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188件，均发生在服务业，主要涉及司机、家政员、美容师、美发师、厨师等职业，这些案件中，61.2%的案件从业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在审理的171件案件中，超过84%的案件双方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但从判决的情况看，朝阳法院判决的105件此类案件中，确认平台与从业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仅为39件，不到四成。

在遇到劳动争议时，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证据，但记者采访中发现，大部分网约工与平台签合同时，从未仔细阅读相关条款，更没有向平台咨询有关工时限制、加班费、解除合同限制、经济补偿等事宜。“我们就是在APP上签订合同的，按照引导一直点击下一步，那么多字，从没仔细看过合同，也不可能提出自己的要求，直到受伤了才了解如何报销保险。”骑手王先生和记者说。

对此，沈剑峰建议，“网约工签订合同时，首先应明确规定合同类型和用工方式，尽可能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法律保护。其次，如果签的不是劳动合同，则一方面应通过较为明确的书面合同条款，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因约定不明而引发的纠纷和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应注意合同条款中报酬条款，比如报酬支付的数量、时间、方式等；以及工作时间条款，意外伤害条款、责任条款等。”

在现有状况下，网约工能做的，往往只是通过口碑，尽可能选择信用资质优良的平台服务。“面对庞大的网络平台，网约工依旧弱势。”沈剑峰说。

福建顺昌：精准施策拔“穷根”

(上接第1版)

兜底措施，确保基本生活

“申请到5万元的贷款，投入国企中，每年能拿4000元的分红。”贫困户陈启根高兴地说。

为解决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脱贫问题，顺昌县创新金融扶贫模式，推出了贫困户与县国有企业合作经营的“快农贷”项目。贫困户在县扶贫办的帮助下，申请3年期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然后与国有企业签订协议，将资金和国有企业合作经营，贫困户每年获得不少于合作资金总量8%的分红。与国有企业合作经营，既降低了贫困户的收益风险，又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一举两得。

因病因残是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因。顺昌县实行兜底医疗保险、兜底保覆盖、兜底红利、兜资产收益、兜统一养老等“五兜”制度，切实保障贫困户基本生活。县里投入205万元为每个贫困人口投保医疗救助保险420元，贫困户医疗费用在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大病补偿以及省市医疗叠加保险赔偿后，剩余的医疗费用最高仍可获得保险理赔3万元。顺昌还将特殊门诊费用列入医疗救助保险，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与贫困户医疗救助保险“一站式”结算。

“要是没有政府出钱看病，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大干镇富村的林永顺感激地说。2016年1月，林永顺患了直肠癌，东拼西凑借了4万多元，才勉强凑够手术费，但手术之后还要进行6次化疗，每次需要5000元左右。“实在没钱治，当时已经想放弃了。”正当林永顺绝望的时候，顺昌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找上了门，他自费的2万多元医疗费全部报销了。

“对贫困户的帮扶，我们应该考虑得更细，考虑得更远。对于他们的帮助，怎么细心都不为过。”顺昌县委书记江建华表示，在脱贫攻坚战中，将创新突破，建立精准扶贫、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行为安全之星”评选活动举行

本报讯 5月22日，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2018年“安康杯”竞赛亲子安康运动会暨争创“行为安全之星”平安工地接力赛在厦门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项目部举行。

据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周彻介绍，此次活动旨在不断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使教育为引导，变处罚为奖励，变“被动安全”为“主动安全”，使一线作业人员逐步成长为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学习安全知识、提高操作技能、懂得自我保护、个人行为安全的新时代建筑工人。

元宝山区提高老年群众防范能力

本报讯 目前，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涉众型经济案件高发且受害群众大多为老年群体，根据这一现状，元宝山经侦大队经过认真分析，组织警力前往辖区老年人相对较多的老小区开展“经侦宣传进社区”防范宣传活动。

在社区活动现场，大队民警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横幅、播放预警防范宣传教育片、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辖区群众介绍非法集资以及传销等经济案件的常见手段，切实提高了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取得了良好效果。（石玮）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创新学习载体

本报讯 中铁九局西南分公司加强从创新学习入手，抓建设、抓管理、抓廉政，促进各项工作水平提升。

他们加强业务学习，“充电宝，补足钙”。结合“忠诚企业、爱岗敬业”活动组织员工进行业务学习，开展好练兵比武活动。公司党委创新学习载体，建设企业文化墙、党建文化墙、图书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优秀企业精神学习宣讲活动，开展“道德讲堂”等活动，使员工在活动中受教育。（李莹）